



“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05）

Serie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 与外交战略调整

潘亚玲 著



**Interaction between U.S. Political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Global Strategy Adjustment**

“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 外交战略调整

潘亚玲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丛书总序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推出的“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旨在深入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影响。

21世纪是世界加速变化的世纪，对于美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美国政治机器的运行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公众和精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大打折扣。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经济复苏缓慢而乏力，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贫富差距的增大、贫困人口数量的上升使得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面临巨大挑战，“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宣泄着来自左右两端的不满。美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答案只能向未来寻找。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美国的国际经济优势在下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军事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削弱了美

2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

国的战略优势。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和俄罗斯的战略复兴,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一度在国际事务中操控全球的好景不再。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可避免地逐步走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加速下滑。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将远逊于它在20世纪创造的纪录。

就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奥巴马的执政意味着重要调整的开始。奥巴马总统不仅致力于结束旷日持久而代价高昂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而且要为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制定新的准则。美国要更多地依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处理外部挑战。要尽力避免在海外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面对的问题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并且这个问题是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的。美国的盟友应该加强自身力量,在处理它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新兴大国,要更多地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来影响它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开启了美国的战略内向进程。这不仅是受两场不成功的战争的影响,而且也是基于对美国自身力量变化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思考的结果。

美国的上述变化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美国研究者来说,及时、深入和全面地研究这些变化,将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国以及世界的发展趋势;客观、准确地分析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有助于我们妥善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21世纪,中国的力量将进一步增长,国际影响力会大大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力量,如何发挥国际影响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需要我

们拥有开阔的视野、远见和敏锐的思维，而深入、系统地研究 21 世纪的美国与世界将对此大有裨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向来注重对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出版这套丛书，既反映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关注，也是要为国内美国研究界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欢迎学界同仁积极为这个平台提供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对 21 世纪美国的深入研究。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大家为这套丛书的成长献计献策。

吴心伯

2014 年 7 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价值观—制度—行为：政治文化与外交战略的互动 | |
| 分析 | 8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的层次分析法 | 10 |
|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外交战略的互动分析 | 29 |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战略的互动历史 43 |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文化的层次分析 | 45 |
| 第二节 从依附到独立：美国政治文化的第一次转型 | 59 |
| 第三节 从富有到强大：美国政治文化的第二次转型 | 74 |
| 第三章 安全危机：转型肇始与小布什总统的围堵战略 92 | |
| 第一节 不再安全：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肇始 | 93 |
| 第二节 围堵衰落：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 113 |

2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

| | |
|---------------------------------------|-----|
| 第四章 经济危机：转型展开与奥巴马总统的驯服战略 | 140 |
| 第一节 不再富足：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蔓延 | 142 |
| 第二节 驯服衰落：奥巴马政府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 | 164 |
| 第五章 制度危机：十字路口与特朗普总统的反击战略 | 191 |
| 第一节 不再团结：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关键期 | 193 |
| 第二节 反击衰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 | 220 |
| 第六章 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未来与中美关系 | 248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未来与溢出 | 249 |
| 第二节 战略不确定时期的中美关系 | 262 |
| 主要参考文献 | 279 |
| 后 记 | 293 |

绪 论

面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令人吃惊的胜利”(stunning victory)，大多数理论家、观察家和评论家都生出一种无力感^①。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凸显了美国政治、社会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凸显了美国精英对上述深刻转型的不理解。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本身暗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同时也正推动这一转型向着更加难以预料的方向前进^②。更令人吃惊的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其外交战略和政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这充分说明，需要在关注特朗普现象、美国霸权衰落、外交战略转变等表

① Carlos L. Yodan, “Explaining Donald Trump’s Political Ascendancy” (March 19, 2016),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www.e-ir.info/2016/03/19/explaining-donald-trumps-political-ascendancy/>, 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6日。

② 对于特朗普的崛起是否代表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是否是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结果抑或推手，更多讨论集中于各类报章评论。参见 Daniel Wagner,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Explains Why Trump Is Still Strong” (December 2, 2015), *Th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aniel-wagner/american-political-cultur_b_8696752.html, 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6日；George Monbiot, “Donald Trump is No Outsider: He Mirrors Our Political Culture” (October 27, 2016),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oct/26/donald-trump-outsider-system-elections>, 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11月6日。

2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

面现象的同时,进一步探讨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而这正是本书的聚焦所在,即:当前的美国政治文化是否正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型?如果是,它将朝向什么方向转变?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这一转型?这一转型本身可能如何影响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地区战略和对华政策等?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如何确保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仍能实现稳定健康发展?等等。更为具体地,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转型及其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关系研究。尽管本书主要聚焦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及其对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但仍需首先进行更为宏观的理论思考,本书的研究事实上涉及三个理论问题。其一,什么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往往被界定为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①,它被认为是一种“心灵的习惯”^②。尽管如此,政治文化具体有哪些要素、在不同的国家有何差异等,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政治文化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那么政治文化的发展或转型取决于哪些因素?例如,政治文化的研究本身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政治现代化的假设,设想了一条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路径^③,

① 有关政治文化的奠基性研究和界定,可参见[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6—12页。

② 有关政治文化对一国或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影响的讨论,可参见[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③ 尽管没有明确论及这一升级转变,但诸多著述试图区分现代的、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政治文化,并暗示其中的“先进”与“落后”差异及实现“进步”的可能,例如,可参见[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因此是什么促使这一转变或升级发生的？又如，尽管人们在讨论美国的政治文化时，往往会指出它包括诸如清教传统、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等诸多要素^①，但很明显的是，从美国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政治文化，与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文化有着重要区别。因此，尽管同一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内核是不变的，但在其内部，不同时期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组合，进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而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固定要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组合是如何发生的？什么力量推动了先前的组合方式的崩溃，并产生了新的组合方式？换句话说，政治文化是如何实现转型的？其三，一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对其对外战略有何影响？政治文化决定着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战略或外交战略，如对“敌人”的界定、对安全的追求、对道德的信仰等，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不可见的。只有在理解政治文化和一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一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其外交战略调整的相互关系。

其次，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历史转型和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类似前一方面，这也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尽管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al Almond)将美国政治文化界定为“参与型政治文化”^②，但美国政治文化内部显然还有多种组成要素，如宗教传统、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围绕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组成要素的争论仍在进行，特别是在不同时期到底哪些要

① 依据其内部要素而逐一讨论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近著述，可参见邢悦、詹奕嘉：《权力是靠不住的：美国政治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5章。

②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406页。

素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其二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转型。如果回顾美国历史发展,作为民族的美国人首先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因此其政治文化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欧洲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为准确地,美国的政治文化是通过美国独立革命而完成其建构的,尽管这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第一次转型,即从依附到独立,考虑到其与欧洲政治文化事实上的延续性的话^①。自1898年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以后,美国政治文化进入其第二个转型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基本完成。这些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它们促使美国政治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而那些在特定时期被压抑的要素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生存并在恰当的时机再次爆发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对理解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转型有着重要意义。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转型及其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很明显的是,美国独立革命后形成的政治文化并不鼓励其全球性介入,而乔治·华盛顿总统所确立的“孤立主义”也是这一政治文化下的外交战略标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美国已经拥有了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但很大程度上由于苏联的存在,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根据阵营划分、采取“榜样”或“讨伐”政策,塑造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转变的现实基础。而今天,人们的讨论总围绕美国是继续推行霸权、还是回归孤立主义、抑或创造出第三条道路展开,很大程度上既暗示了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之间的路径依赖,也暗示了美国当前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① [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

再次,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转型及其对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影响。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是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文化的急速强化甚至急剧膨胀时期,那么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政治文化迅速被不断发生的各类现实所瓦解,并迅速陷入一场可能是长期的转型进程之中。很大程度上,由于冷战时期“旧敌人”的消失和当前“新敌人”的模糊,美国国内政治安排的诸多弊端日益显现,再加上高速的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推动美国的民主政治发生自独立革命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政治极化和分裂政治的持续发展、宗教复苏与道德二元化、技术发展与技术依赖性、人口多元化与大众政治觉醒等。这一政治文化转型与冷战结束所启动的国际体系转型相结合,推动了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很大程度上以美国霸权衰落作为外交战略制定的前提假设,以尽可能延长霸权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为根本目标,因此总体上正从“国内民主、国际霸权”向着“国内专制、国际祸乱”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一进程暗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即帝国或霸权衰落导致的政治文化转型可能有着重大的国际战略后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代国际体系与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是相同步的,进而这种外交战略调整本身又反过来影响美国自身认知和世界观的相应改变,或者说它也会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产生某种反作用^①。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美国极可能由于霸权的相对衰落而逐渐演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大国之一而不再是主导大国,这对于促进美国从例外主义、特殊主义向着正常国家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① [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最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外交战略调整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转型与冷战结束后启动的国际体系转型是同步的,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首屈一指地位的逐渐消失;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本身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起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进而与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也有着直接联系。尽管只是当代全球体系和国际体系的双重权势转移^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出于战略简化和战略聚焦的考虑,美国很大程度上将其霸权地位的起伏归结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尽管在全球体系的几乎所有问题领域和国际体系的大多数问题领域中,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但就传统的国家间权势斗争而言,美国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进而,不仅其外交战略调整以此为假设展开,而且其国民认同、意识形态等都围绕这一假设加以重构。换句话说,尽管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但美国政治文化转型所导致的外交战略调整的核心假设是,中国是其明确的“假想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带来的实力不足和权势转移本身远超出中美权势转移的多重性,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及由此而来的外交战略调整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同时,还需确保中国在前述诸多方面的合作,也就导致了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最根本内在矛盾,即中国“非敌非友”,进而为推进中美关系提供了重大机遇。

本书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理论上,本书将全面考察政治文化作为美国综合国力变迁与外交战略调整间的桥梁的深层次逻辑及其转换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进入 21

^① 有关当代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双重权势转移的讨论,可参见张春:《双重权势转移视阈下的奥巴马政府对非政策》,《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20—26 页。

世纪后的三位美国总统如何应对霸权衰落，并实施相应的外交战略调整。政策上，本书将全面考察霸权衰落背景下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可能趋势，深入分析在霸权衰落和政治文化转型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趋势，并前瞻思考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本书主要采用理论、历史与政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政治文化及其转型与美国外交战略的相互关联这一问题。本书将从政治文化及其转型的视角，探讨其对美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影响，并考察其对美国的地区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分析中国崛起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相互关联，进而为中国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书还将采用案例分析法，重点探讨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政治文化转型及其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并考察其与当前的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关联，以观察其中的延续与断裂。本书也将以美国地区性和领域性的政策调整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等为案例，探讨其政治文化转型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本书由“绪论”和六章正文组成：“绪论”是全书总纲，简要说明了本书的选题背景及内容；第一章旨在为分析当前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及其与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互动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考察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转型；第三、四、五章是本书的重点，旨在揭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演进过程；第六章旨在探讨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未来发展、其国际溢出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在美国战略不确定时期的的整体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章

价值观—制度—行为： 政治文化与外交战略的互动分析

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撰文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所享受的长达十余年的“历史的假期”已经结束；当然，威尔并不认为这会危及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物质强大^①。但“9·11”事件被证明是美国的社会福利与物质强大开始走下坡路的触发性事件，它瓦解了美国已然享受200余年的地理性绝对安全；而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所启动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极大地消耗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所积累的财政盈余，更间接触发了美国的经济崩溃，后者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全面拉开了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大幕。换句话说，当美国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并在赢得冷战后短暂“休假”后回归，却发现世界已经完全变了。美国人现在相当迷茫，这个世界已

^① George Will, “The End of Our Holiday from History” (September 12, 2001), *Jewish World Review*, <http://jewishworldreview.com/cols/will091201.asp>, 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6日。

经变得完全陌生：国内政治的极化发展使美国自由民主体系的危机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①；而冷战结束所启动的国际体系转型也因为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而风云突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快速增生、大众政治意识普遍觉醒、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所有这些都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一种“假期综合征”发生了，美国现在更多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变成了一个“恐惧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Fear）^②。在这一视角下，经常使用恐吓性言辞的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似乎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美国是如何从“美利坚合众国”演变为“恐惧合众国”的？这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有何影响？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不同的观察者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

本书尝试超越诸多现实表象，从更深层次探讨美国当前仍在展开的重大转变，即考察美国在遭受如此的“历史玩笑”之后，其心态、身份认同等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的潜在影响。换句话说，本书尝试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战略的既有和可能演变，特别是其迄今为止并不算长的历史轨迹。尽管既有研究也讨论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更多从“进步”视角出发的有关政治文化如何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讨论。对于诸如“传统”或“现代”政治文化内部的转型，相对讨论很少。尽管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政治文化内部都可能存在多种类型，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政治文化总体上被假定为相对稳定和相对固定的，由此而来的政治文化对一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也往往被视

① Thomas E. Mann and Norman J. Ornstein, *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it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p.3–30.

② Tom Engelhardt, *The United States of Fea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1, p.19.

为固定的和单向的,进而也往往被认为是可以忽视的。笔者认为,所有政治文化事实上都处于持续的演变——这极可能不是“进步”或“升级”——过程中,既包括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阶段的演变,也包括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内部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

本书并不试图评价有关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研究,而是试图考察目前相对讨论更少的政治文化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可能转型,特别是单一政治文化在不涉及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情况下的转型发展。在这一讨论范围内,笔者认为,政治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源于其内部各要素间的组合方式在特定时期的相对稳定,但在诸多内外部冲击下,这种组合方式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导致政治文化的转型。由此而来的,先前在外交战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要素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一国外交和战略的相应变化或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极可能是相互的,因为外交和战略的具体实施必然引发其他国家外交战略的相应调整,这一反馈可能印证或者证伪一国外交战略的正确性,进而间接检验其政治文化转型的方向正确性。

第一节 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的层次分析法

尽管对居于一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政治文化的思考和关注由来已久,但对作为学术范畴的政治文化的研究却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首创“政治文化”概念,使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从一开始,阿尔蒙德便强调政治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与变